

阿英晚清文學研究中的史料意識初探

——以《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為中心

韓知延*

目 錄

1. 引言
2. “文史一體”的選編思路
3. 以“史”說文，以“史”解文：《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之史料意識
4. 結語

中文摘要

本論文以阿英編著《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並將晚清時期的文學期刊和小報作為研究個案進行考證和探討。本研究的著重點在於阿英在晚清文學研究和史料彙編的過程中如何追求自己獨具一格的編選思路和史料意識，以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在他的史料編著的過程中如何呈現。

至於阿英的編選思路，這在上世紀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中，他沿著“文學”與“政治”一體化的方向，並以社會和歷史的責任感追根溯源，由此確立以“文史”為一體的價值觀及編選思路。顯然，阿英“文史一體”的價值觀及編選思路，不只局限在他早期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還對他後期的史料搜集整理及研究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由此可見，這就體現在他後期所編的《晚清文藝報刊述略》。

《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是阿英後期的著作中專門記報刊的著作之一，在此書中阿英專門介紹了晚清二十三種文學期刊。此書由《晚清文學期刊述略》、《晚清小報錄》和《辛亥革命書證》三個部分組成。其中，《晚清文學期刊述略》、《晚清小報錄》正是阿英基於收藏史料的基礎上編選而成的。他對晚清期刊進行全面而細致的評價，深入挖

* 중앙대학교 아시아문화학부 부교수 (中央大學亞洲文化學部副教授)

掘其中所蘊含的史料價值，既闡發晚清文學期刊的歷史意義，其史料意識之敏銳、史料研究之細致是顯而易見的。

總而言之，《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是出於對現實社會的深刻考慮而著手編著的，由此確保那些原始文獻的價值得以發揮，並有助於彰顯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價值所在，從而確立晚清史料從發掘整理到專門研究的整體脈絡及其可能性。

關鍵詞：阿英，晚清，《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文史一體，史料意識

1. 引言

阿英（1900-1977）¹⁾，通常被稱之為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他對中國近代文學、中國新文學史料²⁾的發掘整理、對晚清文學，尤其是對晚清小說的研究³⁾和對文學史料的收集方面用力甚勤。縱觀阿英的研究生涯，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他的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即“資料的整理與出

- 1) 原名錢德福，又名錢杏邨，筆名阿英、錢謙吾、魏如晦等。其中，“阿英”是1950年之后固定的署名。因本文的研究對象（即《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為1957年所編著的，故在此一律使用他後期所使用的署名。
- 2) 指的是《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該書共分十一部分，分別為總史、會社史料、作家小傳、史料特輯、創作編目、翻譯編目、雜誌編目，最後為中國人名、日本人名、外國人名和社團的四則索引。單從這些體例的編排上，該書被評價為阿英史料工作的思路便超越了“為文學而文學”、“為史料而史料”，而致力於在文學史料中透視歷史。而從重大“事變”的角度切入歷史，將“事變”與史料相結合，就為他限制史料工作的範圍，進行“斷片”式的整理提供了契機。參見陸成，〈阿英的史料學思想〉，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2005年，第223-227頁。
- 3) 指的是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晚清小說史》。此書除了總述（指的是第一章“晚清小說的繁榮”、第二章和第三章“晚清社會概觀”）之外，分別論及“庚子事變”、“反華工禁約運動”、“工商業戰爭”、“反買辦階級”、“立憲運動”、“種族革命”、“婦女解放”、“反迷信運動”、“官僚生活”、“講史與公案”、“翻譯小說”等各類主題，將這些主題放置到晚清社會政治背景之下，並對重要作家作品作出了中肯的評價。詳見阿英，《晚清小說史》。收阿英著，柯靈主編，《阿英全集》第8卷目錄。以下阿英原著所引版本相同，只注作者名、書名和頁碼，出版信息則不另注。

版”、“編寫書目”和“研究論著”。此外，他還對中國近代小說理論、彈詞、翻譯文學等一些領域，也多有研究。⁴⁾言簡意賅地講，阿英的治學實踐，即是近代和現代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就足以證明阿英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治學興趣；其次，阿英所做的史料證集匯編，可以分爲晚明、清末民初和中國新文學。據相關研究了解，阿英的資料搜集，是從1930年代前期在上海開始的，這時候他廣泛搜集晚明⁵⁾和清末民初的文獻資料，並編寫有關史料匯集方面的著作，專心從事“史料研究”⁶⁾和“晚清文學研究”。

正是基於此，本文將阿英後期所著中專門記報刊的著作《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作爲研究對象，試圖觸摸阿英在晚清文學研究和史料彙編中所呈現的編選意識、史料觀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出於以下幾點緣由：

首先是出於對報刊本身的“史料性”。當我們牽涉到這一點時，我們必須意識到：第一、很多作家在作品結集成書時，對原作加以刪改，以後又隨著意識形態的變化而不斷修整自家的著述。尤其對於文學史家來講，試圖了解作品的初刊與修訂，是必要的過程；第二、我們之所以要關注報刊本身，不只是因爲它的史料性，而且還能夠與前代或同代的作家進行對話。在這樣的對話過程中，既可以發現新的資料，也可以讓我們對舊說提出質疑，對歷史有新的詮釋。⁷⁾從這一點來講，晚清以降的文學，主要以報刊爲中心來展開，可謂是以

4) 參見郭延禮，〈阿英與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載《東岳論叢》第6期，2002年，第125頁。

5) 據柳亞子（1887-1958）1942年7月27日在桂林所寫的回憶，阿英以標點晚明著作問世，並對於南明歷史的書籍，阿英藏本甚多，並且在他研究的過程中，他所有南明史料的來源，一部分是阿英代他搜購得來的（如《史外》、《南疆釋史》、《小腆紀傳》、《小腆紀年》、《晚明史籍考》等）；另一部分是阿英借給他的（如《痛史》、《明季禪史》、《明季南略》、《臺灣外記》等）。詳見柳亞子，〈懷念阿英先生〉。收柳亞子著，《懷舊集》，上海：耕耘出版，1981年版，第4頁。

6) 有人認爲阿英爲何致力於史料的保存，是因爲他對文學史料工作緊迫性的認識，因爲當時的中國處於一個激烈變動的時期，資料不是搜集但却極易散佚，因此阿英才致力於搜集、保存資料。而有人則認爲阿英重視史料收集並不在於他對文學史料工作的責任，更在於他有一種自覺的史料意識。參閱陸成，〈阿英的史料學思想〉，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2005；參見李丹宇，〈關於阿英史料學思想的思考〉，載《晉陽學刊》第1期，2007年。

7) 參見陳平原著，《文學的周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05-106頁。

刊物為中心的文學時代⁸⁾。可見報刊被作為近代史料的重要類別之一，既有助於還原中國近現代文學的歷史形象，也有助於進入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主要載體和傳播媒介。尤其是晚清報刊的出現，使文學體裁發生演變，促進文學進化的重要歷史線索，由此成為中國文學近代轉型的重要動力。為了解析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本文之所以重新論及曾經被眾人所關注的報刊的“史料性”，就因為其中蘊含著阿英本人從早期到後期呈現出追求“文史一體”⁹⁾的價值取向，並在史料編選過程中則體現出嚴謹求真的史料意識。這裡既有個人偏好，也有學術趣味，兩者融為一體，由此呈現出文學發展的時代性和多樣性。可見阿英所搜集整理的文藝報刊，既是他史料研究的重要基礎的同時，也是他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其價值可謂極其重要。

其次是出於對《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的文獻價值。根據上述內容，考慮到晚清是中國文藝報刊的繁榮時期，阿英編著《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的文獻價值，不能一概而論。從著述時間來講，此書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特殊時期（指的是1957年反右的特殊時期），在這種特殊時期中，要順應時代的變化規律以及現實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的需求，從中恰當運用理念就是主要因素。而從內容來講，全書分三部分，即《晚清文學期刊述略》、《晚清小報錄》和《辛亥革命書證》，可以說既是晚清文藝報刊的第一次“大集目”，也是晚清文學研究工作者及報刊史研究工作者重要的參考資料¹⁰⁾，因此《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的文獻價值，尤其顯得彌足珍貴。正是基於這一點，同時也考慮到阿英其人其文在中國近代文學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及其影響，其研究的重要性更為不容忽視。

最後是為試圖彌補前人研究之不足。與中國學術界不同¹¹⁾，至於目前韓

8) 參見陳平原著，《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頁。

9) 至於此，將在第二章中予以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10) 相關表述參見胡繼武，〈晚清文藝報刊拾零〉，載《文獻》第3期，1980年。

11) 中國學術界對阿英其人其文的研究狀況，可分為兩種範疇：一是阿英與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含晚清小說），另一是史料學、文獻學、目錄學之類範疇。前者主要研究對象集中在阿英《晚清小說史》，其研究的焦點在於阿英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所做出的貢獻及其意義；後者是指除阿英的文學研究外的領域，其研究的重點在於阿英在史料學、文獻學和目錄學之類範疇

國學術界對阿英其人其文的研究狀況，對此不夠重視，整理和研究都顯得極為薄弱¹²⁾。考慮到韓國學界對阿英其人其文研究的不足之處，需要進行相應的研究。基於以上緣由，本文將阿英編著《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在正文中將它分為兩個研究個案進行探討。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中所提及的文藝報刊較多，此外還論及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史籍，此論文的研究範疇僅限於晚清時期的文學期刊和小報進行相應的探討。換言之，其研究的著重點在於阿英在晚清文學研究和史料彙編中如何追求自己獨具一格的編選思路和史料意識，以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在他的史料編著的過程中如何呈現。本文謹慎認為，之所以需要關注和了解阿英後期所編著的《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是因為它既有助於進一步了解阿英其人其文，也有助於彌補一直以來被人們忽視的研究個案。

2. “文史一體”的選編思路

談及阿英的文學研究，最為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晚清文學研究。一方面，他明確地意識到史料的重要性，由此作出大量切實有效的史料工作，這一點尤其在他的晚清文學研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成為他廣泛的文藝活動和學術研究

中所體現的精神內涵（如藏書思想、目錄思想和史料學思想等）。縱觀中國學術界對阿英其人其文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數量雖然不算十分豐富，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應的研究成果。至於研究成果目錄，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贅述。

- 12) 目前韓國學術界對阿英其人其文的研究狀況，只有兩篇由韓國學者在學術論文中若干提及到阿英著作，其實嚴格意義上來講，上述兩篇文章也不是屬於專門研究阿英其人其文的：有一篇是圍繞翻譯文學，即在翻譯文學選集在中國文學經典的形成過程中若干論及阿英編選《晚清文學叢鈔》中的《域外文藝譯文卷》（指的是金素貞，〈當代中國的文學經典之形成過程——以三種翻譯文學選集為中心〉，載《中國語文論叢》第59輯，2013年）；而另有一篇的研究課題為明清書籍中的插畫研究，除魯迅、鄭振鐸外，還談到阿英關注民間曲藝如晚清連環畫（指的是金秀玟，〈明清書籍插畫研究的意義及其課題〉，載《中國語文論叢》第64輯，2014年）

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1930年代初，阿英已在敏銳地意識到史料的搜集和保存的必要性。據阿英所述，他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間，編寫了不少書錄，如《近代國難史籍錄》、《中英鴉片戰爭書錄》、《太平天國書錄》、《中法戰爭書錄》、《甲午中日戰爭書錄》、《庚子事變書錄》、《辛亥革命書證》、《清末小說雜誌略》、《晚清小說目》、《晚清戲曲錄》、《晚清小報考》、《國難小說叢話》、《中國新文學大系》（索引卷）等。直到一九四一年到華中解放區後，亦曾續成數種，如一九四五年三月在雜誌《新知識》第六期《戲劇專號》上所發表的《華中根據地戲劇書錄》、《華中文學期刊略》、《華中根據地書錄》等。¹³⁾ 對此有人認為阿英為何致力於史料的保存，是因為他對文學史料工作緊迫性的認識，因為當時的中國出於一個激烈變動的時期，資料不是搜集但却極易散佚，因此阿英才致力於搜集、保存資料，將“歷年搜訪所得，刊為目錄，公之於世”¹⁴⁾；而有人則認為阿英重視史料收集並不在於他對文學史料工作的責任，更在於他有一種自覺的史料意識¹⁵⁾。由此可見，無論是對工作的需要，還是自覺的史料意識，或是哪個時代和研究領域，阿英一生都注重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¹⁶⁾，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從1930年代開始，由於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的傳播，很多文學史家開始關注小說、詩歌、戲劇中所體現出來的社會生活的變遷，從這個角度進入中國文學研究的，不妨以阿英在晚清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彙

13) 詳見阿英，〈敘記〉。收《阿英全集》，第71-72頁。

14) 阿英，〈敘記〉。收《阿英全集》第6卷，第72頁。

15) 參見李丹宇，〈關於阿英史料學思想的思考〉，《晉陽學刊》第1期，2007年。

16) 至於阿英的史料工作，除了晚清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之外，還體現在新文學史料的搜集和研究。阿英之所以集中搜集新文學材料，就是因為有過這樣的顧慮：“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學史籍裡，較活潑充實地看到一些當時的運動史實，和文獻的片段，同樣的是難而又難。較為詳盡的新文學運動史，既非簡易的一時的工作，為著搜集的不易，與夫避免史料的散佚，擇其主要的先刊印成冊，作為研究的資料，在運動上，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由此可以證明，阿英致力於近現代史料的保護和完善，以及相關考證工作。致力於近現代文學研究乃至新文學史料的發掘、考證、搜集和整理。至於上述原文，詳見阿英，〈《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序記〉。收《阿英全集》第4卷，第283-284頁。

編為代表¹⁷⁾。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以及革命文學的指定範疇¹⁸⁾下，阿英從“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糾葛及所呈現的張力中確立了文學的時代性和政治性，從而指出文學的社會意義，因為在他看來，“文學”與“政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並行不悖。這無疑是阿英文學研究和史料工作中所呈現的“文史一體”的價值觀。所謂“文史一體”，是指沿著文學與歷史（政治）一體化的方向建構和進行價值取向的文學價值觀念體系。它的核心是將文學活動納入到具體歷史活動之中，以文學對現實的實際效用來評估它的價值。¹⁹⁾當他在“文學”與“政治”關係的認識上閱讀文學作品和編選文學史料時，明確地意識到其史料的價值及其社會意義的關鍵性何在。就此而言，在他的早期文章中有段相關表述：

每一種文藝的組織以及文藝的刊物，旗幟都是很顯明的。我們可以看到三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的運動，一種是代表小資產階級轉換方向的勞動階級文藝運動，一種是直接走上勞動階級的勞動階級革命文藝運動。這樣的分化，有些人以為是不好的現象，我們却認為是中國文壇的進步。凡相信文藝是社會生活的表現，認識社會生活的，誰個都可以說這是當然的一種結果。

我們認定文藝是和政治分不開的。這種種分化，完全是證明了政治對於文

17) 除此之外，至於討論晚清的研究思路，不外以下幾種：一、從“歐西文思”如何解讀晚清文化與文學，這一思路，從1920年代就已形成；二、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由於特定的意識形態需要，強調“反帝”、“反封建”的意義；三、認定晚清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向西方學習。參閱陳平原著，《文學的周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95-96頁。

18) 指的是1928年革命文學論戰，被評價為近代中國左翼文壇內部的一次重要紛爭。這場論戰由留日學生雲集的創造社率先發起，立即得到了太陽社、我們社等文學社團的支持和響應。論戰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主題，著重討論以下三個問題：何為“革命”、“文學”與“革命”的關係，以及“革命文學”的建設問題，是魯迅、茅盾與創造社、太陽社等文學青年關於“革命”以及“革命文學”思想的一次集中交鋒。當時“革命文學”主張的廣泛提出，是在1927年以來國民黨發動大規模清黨、大革命深陷低潮之時，中國左翼文人試圖改變社會現狀、尋求未來出路的直接突破口。這無疑對於深入20年代中國革命的思想意識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參見李都：《從“革命”到“文學”——1928年“革命文學”論戰中的理論爭端》。收王元周，徐鵬著，《近代中國：地域秩序與社會變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2-363頁。

19) 參見程金城著，《20世紀中國文學價值系統 1900-1949》，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69-70頁。

藝的影響。……文藝是有階級性的，文藝是離不開時代的，政治上的階級色調既如此顯明，有時代性的文藝也就不能不走上階級分化的一條路了。²⁰⁾

從上述引文中明顯地看到阿英所堅持的一貫姿態，他既十分注重現實文化的發展狀況，也以“激進”的方式來直率地表達自己的見解。需要指出的是，其背後所隱藏的是他對歷史的一種敏銳的感覺，阿英的“歷史感”，正是他文學活動中所呈現的思想性和趣味性的有機結合。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理論工作²¹⁾，他都要以“批評”和“歷史”的立場（或以“批評家”和“史家”之眼光）來對過去的時代、過去的歷史進行一種自覺性的“回顧”，這一點在他的晚清小說研究和新文學研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從而指出將“文學”與“事變”相結合的。²²⁾

縱觀阿英的文學活動及其背後“文史一體”的價值觀，可見有其明顯的時代性，在這種強烈的史料觀的關照下，他所追求的是“文學”、“歷史”與“政治”一體化的方向，即如何認識和理解文學，從史料中如何表達宏大的時代主題，在這一宏觀的歷史進程語境中如何呈現文藝的社會意義及其作用。歸根結底，阿英對史料的正視和重視是學術研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和理論根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文史”為一體的史料整理思路始終貫穿著他的整個學術生涯，並以此為基礎，阿英進而指出要“在史的時間意義上”搜集、整理和研究史料的中心思想，這一點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料編著體現得尤為突出：

現在說到雜誌的編目。關於這一部分的存在，曾經有過很長時期的考慮，就是有沒有編目的必要。自然，只為著檢查的便利，有著索引已够，不必再來一個編目。就史的意義上講，却又覺得不可少。因為這些支配著當時運動的典籍，現在已不容易找到。即從已輯集的單本或索引裡可以看見標題，對於這文字所以寫作的動機，和在發表時間上的重要，還是不免於有些茫然的。有了這樣的一個編目，再加有出版期的註明，則一路看來，使從題目上也可見當時文運是在如何的向前發展，好像是在讀一部有系統的

20) 阿英，〈批評的建設〉。收《阿英全集》第5卷，第178-179頁。

21) 包括民間文化研究、中國小說史研究、文獻研究和文藝批評等。

22) 參見陸成，〈阿英的史料學思想〉，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2005年，第214頁。

文學史書。若是在論戰期內，更可連同對方雜誌編目互看，看雙方如何的在刀槍相敵，各文來路極明。要考察作品在史的時間意義上，編目是非常重要的，而況這些雜誌已難於尋覓？²³⁾

當阿英探索出一條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新路徑時，對此極為肯定，這是因為“其激急與繁復，是歷代文學中所不曾有過的”，由此阿英呼籲“產生較優秀的新文學史，資料索引一類書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是有著必要的”²⁴⁾。也正因如此，阿英進而主張從這些史料內外的歷史語境中，試圖了解“對於這文字所以寫作的動機，和在發表時間上的重要”，乃至於“可見當時文運是在如何的向前發展”。阿英之所以著手選編文學史料及其相關的文字，是因為他當時已自覺地認識到保存、整理、研究文學史料的現實性和迫切性²⁵⁾，也是因為“編成一部文獻的書，既可以免散失，便檢閱，在文學運動²⁶⁾方面，也是很有意義的”²⁷⁾。

縱觀以上所述，在上世紀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中，阿英沿著“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歷史”）一體化的方向，以社會和歷史的責任感追根溯源，由此確立以“文史”為一體的價值觀及編選思路。顯然，阿英“文史”一體的價值觀及編選思路，對他後期的史料搜集整理及研究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這就體現在他後期所編的《晚清文藝報刊述略》。

23) 趙家璧主編，阿英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序例》，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第4-5頁。

24) 阿英，〈《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編選感想〉。收《阿英全集》第4卷，第302頁。

25) “雖只是短短的二十年內的事，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已令人起‘渺茫’之感。……其實，不僅回想起來，使人起寥遠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現在，想搜集一些當時的文獻，也真是大非易事。……較為詳盡的新文學運動史，既非簡易的一時的工作，為著搜集的不易，與夫避免史料的散佚，擇其主要的先刊印成冊，作為研究的資料，在運動上，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阿英，〈《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序記〉。收《阿英全集》第4卷，第283-284頁。

26) 指的是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料》（署名張若英）。

27) 阿英，〈《中國新文壇秘錄》前記〉。收《阿英全集》第4卷，第275頁。

3. 以“史”說文，以“史”解文：《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之史料意識

寫於1957年的《晚清文藝報刊述略》²⁸⁾是阿英後期所著中專門記報刊的著作之一，介紹了晚清二十三種文學期刊。就此而言，此書的引言給我們提供極為重要的歷史線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國作家協會召開“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為配合這一會議，作協和上海市報刊圖書館，曾聯合舉行了“全國文學期刊展覽會”（一九〇二—一九四九），很受文藝界的歡迎。

會上展出的晚清文學期刊，有《綉像小說》、《新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小說時報》和《小說月報》七種。實則當時所刊，至少在三十種上。始刊期亦非一九〇二，以小說報論，應始於一八九二；以一般文學期刊論，應始於一八七二。這情況，曾簡略的和與會同志們談到。

為著彌補這一缺陷，並使同志們較詳盡的了解當時文學期刊發展情況，從會議以後，我就著手編寫這一本書錄。時作時輟，經過半年多，現在總算草草寫定了。從一八七二到一九一一，凡四十年，當時文學的流派，創作的成果，以及文學運動的路是怎樣結合政治運動走了過來，提到文學為政治服務、為革命服務的高度，我想多少是能看出個概略的。

由於藏籍損失甚多，有些刊物又至今沒有訪求到，這一著錄是不够完整的。希望得到同志們的幫助，俾能補充修訂，臻於完善。²⁹⁾

晚清文學在中國近代社會中的作用及其意義無法忽視，據阿英所說：“晚清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個最繁榮的時代。所產生的小說，究竟有多少種，始終沒有很精確的統計。……所以在當時，不僅新聞紙競載小說，專刊小說的雜誌，也就應運而生。”³⁰⁾顯然，晚清無疑是個以刊物為中心的文學時代，淋漓盡致地展示出晚清特定的時代風貌與當時文壇許多人士的文學趣味。從這一點講，後期阿英所編的《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以晚清與報刊之間、報刊與文學

28) 此書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

29)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引言》。收《阿英全集》第6卷，第233頁。

30) 阿英，《晚清小說史》。收《阿英全集》第8卷，第3-4頁。

群體之間的互動為根本，由此產生兩者之間的交互關係，從中反映出晚清民國這一特殊時期說不盡的文化景象。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950年代後期，阿英為何著手重新搜集編輯晚清報刊，對此有以下幾點理由：一、阿英將“晚清”看做一個文學史階段的概念，並將“晚清文學”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發展階段，因此將它作為一個具有文學史意義的概念的用意相當明顯，並為之付出了切實的努力³¹⁾；二、阿英之所以著手編輯《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是因為出於配合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的“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據相關史料記錄，當時所召開的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正是圍繞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本方針展開的，自從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後，在文學藝術領域中出現了活躍的景象。作為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的主要園地的文學期刊，首先便面臨著一個極為重要而迫切的問題：即如何正確地在刊物上貫徹執行這個方針，以推動文學事業進一步的發展和繁榮，這就成為這次會議的首要任務。此外，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系，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頑強的戰鬥性這是進步的、革命的文學刊物所固有的光輝傳統。基於這一點，當時中國作家協會和上海市報刊圖書館在此會議期間共同舉辦“全國文學期刊展覽會”，並作了具體而生動的說明。根據資料記錄，當時舉行的全國文學期刊展覽會上，展出了1902年到1949年全國文學期刊和主要的綜合性期刊，大會還邀請了葉聖陶、徐調孚、阿英、樓適夷等幾位二十多年前的老編輯出席講話。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共同回憶起當年在白色恐怖統治時期，怎樣在各種困難的情況下辦刊物。據他們說，那個時候辦刊物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要說話，要戰鬥。作為一個進步的、革命的刊物編輯，要善於通過刊物發動討論，進行鬭爭。³²⁾

上述史料足以證明，《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是出於推行中國歷史上所謂的

31) 左鵬軍，〈近代文學的自覺和奠基——阿英的近代文學研究及其學術史意義〉。收左鵬軍著，《近代戲曲與文學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14-315頁。

32) 署名本刊記者：〈辦好文學期刊，促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記“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原載於《文藝報》1956年第23期。收楊志一著，《楊志一詩文選》，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73、75頁。

雙百方針的考慮和需要而編輯的，正如阿英在《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的引言中所寫的一樣，即“當時文學的流派，創作的成果，以及文學運動的路是怎樣結合政治運動走了過來”³³⁾，阿英從文學為政治服務著眼，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對史料選取的角度和取舍標準，但這在特定的歷史時代語境中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它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阿英基於收藏史料的基礎上編選了《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其具體內容如下：第一部分《晚清文學期刊述略》所收錄的晚清文學期刊二十四種³⁴⁾（含帶訪文學期刊五種，共二十九種）雖然搜集未全，但中國近代時期重要的一些小說期刊都被收錄其中；第二部分《晚清小報錄》所收錄的晚清小報二十六種；第三部分《辛亥革命書證》所收錄的資料，將它分為專著（共二十九種）、史乘（共七十八種）、詩文集（共十四種）、叢書（共十種）、說部（共三十四種）、雜誌（共四十種）以及附編（共一百三十種）³⁵⁾。對此不妨先言簡意賅地回顧一下：

一、《晚清文學期刊述略》：這是阿英出於配合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的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而所作的，1957年10月在《文藝報》上連載。它主要介紹晚清主要的文学期刊，從中國最早的文學雜誌《瀛寰瑣記》（1872）、《四溟瑣記》（1875）和《寰宇瑣記》（1876）等起，被稱為中國近代四大小說雜誌的《新小說》（1902）、《綉像小說》（1903）、《月月小說》（1906）和《小說

33)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引言》。收《阿英全集》第6卷，第233頁。

34) 指的是《瀛寰瑣記》（1872）、《四溟瑣記》（1875）、《寰宇瑣記》（1876）、《侯鯖新錄》（1876）、《海上奇書》（1892）、《新小說》（1903）、《綉像小說》（1903）、《新新小說》（1904）、《二十世紀大舞台》（1904）、《雁來紅叢報》（1906）、《新世界小說社報》（1906）、《小說七日報》（1906）、《遊戲世界》（1906）、《月月小說》（1906）、《著作林》（1906）、《小說林》（1907）、《小說世界》（1907）、《競立社小說月報》（1907）、《新小說叢》（1907）、《國學粹編》（1908）、《揚子江小說報》（1909）、《十日小說》（1909）、《小說月報》（1910）、《南社》（1910）。

35) 詳見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的部分目錄。收《阿英全集》第6卷，第234-235、279-280、324頁。

林》(1907)，至《小說月報》(1910)、《南社》(1910)止，共二十四種。此外還羅列出五種待訪文學期刊，言簡意賅地概括出這些期刊的主要特點及其性質。該書闡述了這些雜誌的基本內容和性質，概括出晚清文學期刊發展的輪廓，從中可看到從1872年至1911年的時間之中的文學流派、創作成果，以及文學運動如何結合政治運動發展的過程。

二、《晚清小報錄》收錄1896年至1911年間出版的小報，因在抗戰初期，阿英就自己所藏著錄成冊，即從《世界繁華報》(1896)、《演義白話報》(1897)等起，至《上海白話報》(1910)、《陰秋報》(1910)和《鶴立報》(1910)等二十六種，對這些各報作了簡要地介紹，即編輯者信息、創刊終刊時期、版式編排等，此外還選錄和介紹書中的文章片斷，由此展現出各個小報固有的風貌，可見作者對每一種小報以有趣的閑話隨筆，敘其大略。此外還有《中國畫報發展之經過》，作為一個獨立的附錄置於文後，對中國畫報的發展概況做了簡要的敘述。其實，阿英之所以著錄，就是因為這些小報也“揭露了當時的社會黑暗，抨擊了買辦、官僚以及帝國主義，奠定了晚清譴責小說發展的基礎”³⁶。可見他對中國報學史進行補闕，正是出於上述意義上的考慮和需要的。

三、《辛亥革命書證》：這是阿英本人所藏辛亥革命史籍為主，並參以《磨劍室藏革命文庫目錄》及其他（指柳亞子）著錄編制而成的。這一部分原載於1941年《學林》第六卷（一九四一年四月刊），轉載於張靜廬輯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收錄清末民初出版的與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單行本書刊206種，分專著、史乘、詩文集、叢書、說部、雜誌和附編，對此進行略述。據阿英所述，收編此書，因他“就近年所得，重加刪補訂正，以供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參考”³⁷，這樣經過刪補修改之後，與以前相比，顯得更加充實。

36)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引言補充〉。收《阿英全集》第6卷，第276頁。

37) 同上，第370頁。

可見《晚清文學期刊述略》和《晚清小報錄》為專門研究中國近代文藝報刊的參考書目；《辛亥革命書證》則為專門研究辛亥革命的歷史、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學的參考書目。不難發現，阿英編著《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的主要背景，具有明顯的特點，“為著彌補這一缺陷，並使同志們較詳盡的了解當時文學期刊發展情況，從會議以後，我就著手編寫這一本書錄。……從一八七二到一九一一，凡四十年，當時文學的流派，創作的成果，以及文學運動的路是怎樣結合政治運動走了過來，提到文學為政治服務、為革命服務的高度，我想多少是能看出個概略的。”³⁸⁾由此進而證明，這裡明顯地帶著一種當時特定時代的政治色彩，但從此書所收錄的資料和內容來講，卻可以發現阿英以“史料”為最主要的文獻整理方式來鉅研晚清報刊、晚清文學的發展和傳播過程，為中國近代文藝報刊研究的深入和領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礎，由此尋求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學和史料學的獨立學術價值。

其中，《晚清文學期刊述略》、《晚清小報錄》正是阿英基於自己收藏史料的基礎上編選而成的。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他所涉及的諸多文獻裡，阿英對“晚清四大小說期刊”³⁹⁾作為進行全面而細致的評價，進而闡發晚清文學期刊的歷史意義。至於此，從如下幾段文字中，可以觸摸到他對晚清文藝史料的認知和史料選編的思路：

……《月月小說》的主要功績，卻應該說是對短篇小說的提倡。刊載短篇之多，開前此未有之局。統計兩卷所載，吳趸人即有“人鏡學社鬼哭傳”等十三種，“黑籍冤魂”也是其間之一。天僂生有“學究教育談”和“孤臣碧血記”。陳冷血有“乞食女兒”、“破產”。蕭然郁生有“彼何人斯”。共約二十餘種。可以說是當時中國新的短篇小說的發展，一種新的嘗試。

其次為翻譯。除俄國“鐵窗紅淚記”（天笑譯）、佚名“美國獨立史別裁”（清河譯）外，主要的都是偵探小說，也有寫俄國虛無黨的小說，長短篇不下數十種，主要的譯者就是周桂笙。偵探小說如“盜偵探”、“紅寶石指環”、“巴黎五大奇案”；虛無黨小說如“俄國皇帝”、“殺人公司”、“暴烈彈”、“女

38) 同上，第233頁。

39) 指的是《新小說》、《綉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

偵探”、“八寶匣”，在當時很風行。這些小說的風行，前者自有其半殖民地中國環境的背景與要求，後者和中國人民對於革命的要求不無關係。如果說，提倡短篇小說，是《月月小說》的功績，那麼，大量的翻譯偵探小說，掀起惡浪，以至發展成爲後來的“黑幕小說”，就不能不說是《月月小說》的劣績了。不過，《月月小說》翻譯名著不多，除魯俄外，却還刊載了法國孟代及比利時馬德鄰（梅特林克）兩位名作家的肖像。這是他們在中國最初的出現。……關於小說的理論建設，《月月小說》也有所建樹。天蠶生所作獨多，有“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中國歷史小說論”、“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贊”及“劇場之教育”。譚有宮琦來城的“論中國之傳奇”。而吳趸人《月月小說鈞》，陸君亮“月月小說發刊詞”，對小說的史的發展及其現實意義，亦多所闡明，但大都從夏穗卿、梁啓超說。吳趸人“李伯元傳”及“說小說”，也應該說對於小說作家和作品研究，是有貢獻的。⁴⁰⁾

因篇幅所限，此處只列出部分原文，但從上述表述中可以發現，阿英不止對具有代表性的晚清小說期刊，還對他親自編選的其他晚清期刊進行詳細地介紹這些文學期刊的由來（含創刊和停刊時間，出版週期、發行期數、辦刊宗旨、主編、撰稿人和發行人、發表的主要創作和翻譯作品，以及在當時社會文化的影響等），給予中肯的評價，有助於全面把握中國近代小說發展的整體脈絡。正是出於這樣的顧慮，阿英進而強調收藏材料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和價值：

曾經有好幾年時間，把研究重點放在晚清小說上，在掌握材料過程中，就接觸到了當時被稱作文藝報紙的小報。先後搜集得的，共有二十多種。這些小報的編者，如李伯元、吳趸人，所發表的作品，如《官場現形記》、《庚子國變彈詞》，都標識著晚清文學創作的發展。還包含了很豐富的民俗學材料。也在一定深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特別是半殖民地都市的上海生活。但在報學史一類的著作裡，便是一張較完整的目錄，也不曾介紹過，這是很不公平的。⁴¹⁾

當我們涉及到中國近現代文學發生和演變時，這裡蘊含著研究者極強的史料意

40)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收《阿英全集》第6卷，第253-254頁。

41) 同上，第275頁。

識。不妨將它放置到阿英其人，顯得尤為關鍵，這就反映在他所著的、所選編的著作中可見一斑。由上可知，阿英對文獻史料的發掘、匯集、整理、出版方面所作出的成就，既體現了阿英對史料的重視程度非同一般，也體現了他對史料研究十分執著，呈現出自己的一貫作風。

阿英在對晚清文學發生及發展的原始資料進行搜集整理中，將它落實到具體的史料編研工作，一方面，他有意識地掌握史料，以及在史料中所收文章的整體狀況；另一方面，他在實際的史料編研工作中，從學科發展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出發，進而強調編選史料的歷史意義及其重要性何在。當阿英編選《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時，一貫堅持“文史”一體的價值觀及編選思路，並將文學作為一種觸摸歷史、透視社會的媒介，對晚清這一特殊時期進行審視和評價。正是基於此，《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中的史料意識，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首先，阿英十分注重史料本身，以“史料”說史，以“史料”解史，讓史料本身講話的客觀性和合理性；其次，此書有封面縮影、引言、報刊目錄（按出版時間排列）、分析刊物特點以及所收錄的篇名，由此重構更加系統的編著體例；第三、整篇文章言簡意賅、思路條理清晰，從文獻分類的角度來講，此書既呈現出較為完整的整體面貌，也不遺漏每個細節，可謂是編者對史料搜集的一番用心和不輕易的功夫；二、阿英的《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縱觀史料的搜集、甄別、闡釋和運用的整個過程，有明確的目的性，符合當時政治環境的現實要求及其價值取向。

阿英通過對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呈現出以“史”說文、以“史”解文的理論邏輯，其史料意識之敏銳、史料研究之細致是顯而易見的。《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是出於對現實社會的深刻考慮而著手編著的，由此確保那些原始文獻的價值得以發揮，並有助於彰顯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價值所在，從而確立晚清史料從發掘整理到專門研究的整體脈絡及其可能性。

4. 結語

阿英一生遊走於晚清文學和新文學的內部和外部、中心與邊緣。尤其是他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來源於他對原始史料的重視與肯定，是出於他對文史具有獨具一格的眼光和見解，以至於影響他的“晚清小說研究”⁴²⁾，成為後來的研究者理解與解釋阿英其人其文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線索。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阿英將晚清報刊（含小報）的興盛看作是促成晚清小說繁榮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因此要全面把握晚清小說的概貌及其發展線索，決不可忽略晚清報刊。顯然，阿英的這種問題意識，既為中國近代報學史進行補缺，也為進一步了解中國近代文學提供良好的研究環境，由此進而構建出中國近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整體框架。

阿英之所以將他的研究重點放在晚清報刊，是因為他曾經把研究重點放在晚清小說上，在掌握材料過程中，就接觸到了當時被稱作文藝報紙的小報，正是因為他明確地意識到那些資料可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史料之基本功能及其用處⁴³⁾。從這一點來講，與當時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以“歐西文思”進入中國文學的角度不同，阿英解讀文學研究的角度和思路，與政治社會背景緊密結合，從當時文學期刊的發展狀況中系統地概括出中國近現代社會生活的變遷。這樣的角度和思路，也充分反映當時政治社會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既契合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也符合政治工作的時代要求，從各方面有助於刻畫出政治社會的每一個角度。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阿英作為一名文學史家，他更為注重文學（文藝）的“原生態”，對於文學史家的立場來講，翻閱舊報刊，令人了解文學的“原生態”，知道人家為何採取這種發言姿態，對話者是誰，有什麼“壓在紙背的話”。在接觸歷史的同時，獲得那個時代讀者才有的共同感覺⁴⁴⁾，便呈現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撰史的風貌和對於晚清文藝研究視野的拓展與深化。

42) 據趙景深所言：“注重目錄，專研晚清小說細心和有恒自是主因。”這就意味著從文學（尤其是小說）、文獻學和史料學的角度來對阿英做出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詳見趙景深著，《文人剪影 文人印象》，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年，第84頁。

43)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引言補充〉。收《阿英全集》第6卷，第275頁。

44) 參見陳平原著，《文學的周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06頁。

參考文獻

- 阿英著, 柯靈主編, 《阿英全集》第4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阿英著, 柯靈主編, 《阿英全集》第5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阿英著, 柯靈主編, 《阿英全集》第6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阿英著, 柯靈主編, 《阿英全集》第8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柳亞子著, 《懷舊集》, 上海: 耕耘出版社, 1981年。
- 趙家璧主編, 阿英編選, 《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 上海: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1936年。
- 趙景深著, 《文人剪影 文人印象》, 太原: 三晉出版社, 2015年。
- 陳平原著, 《文學的周邊》,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
- 陳平原著, 《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
- 程金城著, 《20世紀中國文學價值系統 1900-1949》, 蘭州: 敦煌文藝出版社, 1996年。
- 王元周, 徐鵬著, 《近代中國: 地域秩序與社會變遷》,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7年。
- 楊志一著, 《楊志一詩文選》, 南寧: 廣西民族出版社, 2007年。
- 左鵬軍著, 《近代戲曲與文學論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 郭延禮, 〈阿英與中國近代文學研究〉, 《東岳論叢》第6期, 2002年。
- 胡繼武, 〈晚清文藝報刊拾零〉, 《文獻》第3期, 1980年。
- 李丹宇, 〈關於阿英史料學思想的思考〉, 《晉陽學刊》第1期, 2007年。
- 陸成, 〈阿英的史料學思想〉,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 2005年。

Abstract

A Study on A Ying's view of historical sources reflected in the studying literature of Late Qing Dynasty

- Focusing 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晚清文藝報刊述略

Han, Jiyeon

This paper tak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by A Ying 阿英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takes literary journals and tabloid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research cases to conduct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how A Ying pursues his unique ideas and consciousness of compil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ow the ideological operation mechanism behind it presents itself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for A Ying's editing ideas, in the spe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1930s, he followed the dire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nd traced back to the source with the sense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us establishing the values and editing idea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s one. Obviously, A Ying's values of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his ideas of compilation and selection are not only limited to his early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historical data, but also play a subtle role in his later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historical data.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is reflected in his later compilation of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ritten in 1957, is one of the works written by A Ying in his later period, which specially introduces 23 literary periodical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is book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journal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bloid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mong

them,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journ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a collection of tabloid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compiled on the basis of such a rich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e made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evalu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s periodicals, and deeply explored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contained in them, thus elucidat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s literary periodicals. A Ying's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carried out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which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using "history" to explain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o interpret the literature. It is obvious that A Ying has a keen sen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 meticulous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a wor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as compiled out of the deep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l society,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value of those original documents can be brought into play, and help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overall context and possibility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 A Ying, The late Q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 q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integration of literary and history, view of historical sources

투 고 일 : 2022. 4. 10. / 심 사 일 : 2022. 4. 15.~ 2022.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2. 5. 20.